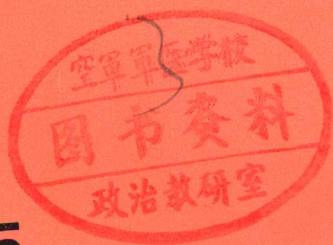


纪念文史知识
创刊五周年

22



1985

WENSHI ZHISHI

文史知识

10



医药学院610 2 01472152

五周年寄语

这一期是我们刊物五周年的纪念专号。五年前的今天，我们筹划、编好了《文史知识》的创刊号。五年，是如此短促，过去的一切，历历犹在目前。那时，宋振庭同志曾大声疾呼：文史知识是通向各种知识领域的桥梁，是攀登科学高峰的起点。庞朴同志也热情鼓励，说《文史知识》的创刊“在知识读物界迸射出一道霞光，使我们为之一振。”创办一个刊物本是平常之事，这些文坛前辈却如此惊喜，如此激动！《文史知识》同人没有从这些善言妙语中产生眩晕醉倒之快感，却从这些赞扬中得到了“临大事而惧”的重负。这五年来我们探索，前进；前进，探索——雅与俗；系统与散；专家与无名作者；有用与有趣；严谨与死板……，这些问题日夜萦绕在我们心头。

五年，又是如此之漫长。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印刷厂每月十三日送来同样厚薄的一册《文史知识》，但有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每一期《文史知识》的设计与编排都有不同，都有变化。这变化虽然星星点点，却凝聚了我们多少希望与幻想！

五年，瞬息即过，中华大地却发生了令人惊诧的变化。改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新的学科一个接一个诞生，“知识爆炸”、“信息爆炸”，好一派兴旺景象！《文史知识》要怎样做才能跟上这时代前进的雄伟步伐？《文史知识》怎样开始它第二个五年？

一代有一代的文化，一代有一代的学术。《文史知识》尽管以介绍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为宗旨，它也必须有八十年代的精神、八十年代的气象，它必须面对“知识爆炸”局面的挑战。正是基于这个考虑，我们特地在五周年纪念专号上组织了“八十年代我们怎样治学”的讨论。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多少明师前辈运用他们的治学方法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在这万象更新的八十年代，我们治学也要更新，也要随着时代的前进、知识的发展，迈出新的步伐。因而，我们谨以这个讨论，作为《文史知识》第二个五年的开始。

为了配合这个讨论，这一期我们暂时取消了原有的栏目（下期即恢复），专文回顾和展望了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的收获和未来的趋向，介绍了国内外新的研究方法，展示了中国文化令人激动的各个方面。

《文史知识》的第二个五年开始了，让我们和广大读者一起，在探索中前进，在前进中探索。

文史知识

1985年第10期

(总第52期)

·《文史知识》创刊五周年专号·

许德珩、周谷城、吴世昌、臧克家题词

封二、封三

八十年代我们怎样治学(讨论)

- | | | |
|--------------------|-----|----|
| 读者来信：八十年代我们怎样治学 | 郑克伟 | 4 |
| 在多样的方法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 李泽厚 | 7 |
| 兼容并包 各展所长 | 金开诚 | 9 |
| 历史学与现代化建设 | 林甘泉 | 10 |
| 吸取新方法应以传统治学方式为本 | 葛晓音 | 12 |

回顾与展望

- | | | |
|--------------|-----|----|
| 中国史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向 | 李 侃 | 16 |
| 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展望 | 章培恒 | 23 |

文史探索

- | | | |
|----------------|-----|----|
| 民俗学与古典文学 | 钟敬文 | 30 |
| 清代学风和诗风的关系 | 钱仲联 | 40 |
| 中国文论的民族特色 | 徐中玉 | 48 |
| 何谓“敦煌学” | 周一良 | 54 |
|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贡献 | 陈 炎 | 62 |

方法论新篇

- | | | |
|----------------------|-----|----|
| 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和新方法 | 董乃斌 | 70 |
| 古诗三解——符号学的试用 | 金克木 | 78 |
| 比较和对照——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常用方法 | 张广达 | 86 |
-

美学漫步

- | | | |
|-------------|-----|-----|
| 唐诗的审美特征 | 蒋孔阳 | 93 |
| 气象 律动 心声 | | |
| ——诗词欣赏与审美感情 | 吴调公 | 103 |
-

- | | | |
|----------------------|-----|-----|
| 建国以来关于若干重大史学理论问题讨论述略 | 王 和 | 110 |
|----------------------|-----|-----|
-

- | | | |
|------------------|-----|----|
| 漫画 祝贺《文史知识》创刊五周年 | 方 成 | 15 |
|------------------|-----|----|
-

• 读者 • 作者 • 编者 •

- | | |
|--------------|-----|
| 编辑部全体同志与读者谈心 | 122 |
| 第二次征求意见致读者 | 124 |
| 来信摘登 | 127 |
-

补白 中国古代的飞行(102)

八十年代我们怎样治学

(讨论)

编者按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时代。现代科学技术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如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是我们面临的现实课题。近半年来，我们不断接到读者来信，询问八十年代我们怎样治学？其中，北京读者郑克伟同志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他说：“今天，仅仅用过去的手段，一本书一本书慢慢地啃，把老一代学者已经走过的老路重复走一遍，然后再开始研究新问题，恐怕我们这一代人永远赶不上学术发展的速度，也永远赶不过老一代学者。”这话说得很尖锐，也很中肯。“八十年代我们怎样治学”这一问题已经严峻地摆在了我们面前。为了帮助广大读者解决这一问题，本刊从本期开始，发起“八十年代我们怎样治学”的问题讨论，欢迎大家就如何改进治学方法，如何开拓知识视野，如何更新知识结构等问题发表意见。

编辑同志：

作为《文史知识》一个长期的读者，我特别爱看“治学之道”这一栏目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老一代学者给我们介绍了许多作学问的方法，因为这些学者都是文史领域中的探索者，因此，这些包含着千辛万苦的肺腑之谈对年轻一代是十分亲切，也是十分有益的。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有的老一代学者不怕家“丑”外扬，把自己走过的弯路和经受的挫折一一告诉给年轻人，使后人不再重蹈覆辙；有的学者则谆谆告诫青年读者，要打好基础，苦练基本功，不要贪走捷径，以致最后虚浮无根；还有的学者则就一些具体研究、学习方法发表了自己长期深思熟虑的意见，如文史结合，不可偏废等等。

不过，我和我的一些同伴读了这些文章后，感动敬佩之余，不免还有些不足，似乎这些文章与我们今天的现实还有些“隔”，但到底“隔”在哪儿呢？我们曾一起进行了讨论和思考。

我们的思考是从这样两个现实的问题开始的。

·读者来信·

八十年代我们怎样治学

首先是我们与老一辈学者学习文史的环境不同。老一辈学者大都是在二、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他们从小就读文、史之书，有的书甚至能背诵下来，在他们读书时甚至可以“偏科”，“对英、算等学科，常常是临时抱佛脚，采取应付的态度”，而且当时的学校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当时研究文史所要求的知识结构与现在大不一样，因此，他们能够出成果，成为这一领域里的专家。而我们现在上小学、上中学，语文、历史之外，还要学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生物、外语……，还有许多其它活动，剩下有多少时间去读文、史之书呢？更不要说去熟读、背诵了。即使想去研读，又到哪里去找这许多书呢？我相信现在的十七、八岁的青年人决没有象老先生当年那样深厚的文史功底的。上了大学或走上社会才开始专攻文史，已经二十岁了，想多背诵熟读，也力所不及了。如果只是为了积累知识，增广见闻还问题不大，可是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达到研究者的水平，恐怕就不是“独抱古经究始终”可以解决得了的了。更何况对现代文史研究者知识结构的要求已经与过去不同了，“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那只是过去的时代。我们想，这一代人学习文史应该有这一代人的新方法。

其次是我们与老一辈学者研究文史的时代不同。当代学术已经出现了综合、交叉的趋势，新的学科一个又一个地诞生，知识的增长速度越来越

快，文史领域也是如此，即出现了所谓“知识爆炸”的局面。仅仅用过去的手段，一本书一本书慢慢啃，把老一辈学者已经走过的老路重复走一遍，然后再开始研究新问题，恐怕我们这一代人永远赶不上学术发展的速度，也永远赶不过老一代学者，而完全用过去的一套，也决不是使文史研究获得新突破的方法和途径。有的学术问题如社会分期的讨论，长期延续，一直得不到解决，分歧反而越来越大，其原因大概就在于研究手段的陈旧和研究角度的狭窄，这样必然造成各持己见，各偏一隅，而且资料陈旧。如果从更高的综合层次上对当时的生态、地理、心理、生产劳动、社会结构、艺术等众多因素进行分析，恐怕效果会好得多。文学史研究也一样，如果能够摆脱泛泛的议论和单个作家孤立研究的方式，把握整个时代的历史、社会心理、生活方式以及其他艺术发展状况，从而对这一时代中的文学现象作出解释，这样，研究水平是否会高一些？而现在的文学史研究中，令人感到最大的问题也是方法旧、形式旧，如很大一部分研究者对历史背景只是作一种机械的介绍，好象一个蹩脚的照像馆里画的布景，李白来了站在这里照一张，王维来了站在这里照一张，杜甫来了也站在这里照一张，可是为什么李白、王维、杜甫在几乎相同的历史背景中产生，却思想风格各异呢？这里除了对作家本身进行研究之外，还要对作家的交往、最容易影响到他的社会心理、宗教、

其他艺术等等方面进行分析。可是这种综合考察的文章还不多，也不深，原因恐怕与研究者拘守一隅，对其他方面知识所知甚少有关。然而，要对众多学科的知识进行了解，建立起更广阔、更合理的知识结构是不容易的。所以，单靠旧的方式治学，在新的时代中恐怕很难胜任创造新局面的任务。

我们如果了解一下今天世界学术发展就可以发现，学术（包括文史领域）发展有几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是综合，即原来认为只是某一学科的研究，现在发展为多学科的协同研究。比如历史研究中的古代史研究，过去主要是从文献中考求，后来发展到文字学、考古学，而现在则运用了统计学、社会学、生态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艺术学，甚至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成果和方法。象对原始人类历史的研究成果，就应该把主要功劳记在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身上，是他们首先粉碎了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创造世界的谎言，证明了人类的历史和地球的历史远不是几千年，而是几十万年和几十亿年。即使是研究近代史也是一样，不懂得科技、文化、心理、民俗，只在政治、经济上作文章，那只能对近代史作出片面的、干瘪的分析。第二个趋势是新的学科和新的手段不断出现。仍以历史学为例，自二十世纪初美国鲁滨逊“新史学”（又称综合文学）出现之后，又涌现出不少新的历史学派，如心理历史学、计量历史学、新

经济历史学、社会历史学等等。在文学研究中，也有比如借助计算机的意象统计法，运用比较的比较文学、综合文学，艺术、宗教、社会的社会文艺学等等，它们的特点是都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科的交叉点上建立起来，充分利用一个学科的知识、方法，对另一学科作出新的解释、提供新的角度、新的方法。不可否认其中有些观点和方法并不可取，有的还很幼稚，但他们在很多问题上是有贡献的，特别是这些新的学科、方法的产生，为文学、历史学带来了很多新问题，象对过去人类的心理行为的分析该不该忽视？如果不该忽视，该怎么研究？对于统计学方法，该不该吸取其合理因素？如果吸取，又怎样避免其缺陷？近来，我国一些研究者也采用了一些新方法，如控制论、结构论来研究历史，这就是一个信息。且不论他们的方法正确与否，但面对着层出不穷的新学科新方法，应该不应该采取鲁迅的“拿来主义”，突破传统的模式，使文、史研究水平得到提高呢？我想这些都是应该积极探讨的。第三个趋势是学术反应越加敏感、迅速。自从电话、电报、电视、传真技术、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不断运用于社会科学以来，各国学者对于各种信息的处理速度加快了。过去各自关门读书的方式已经不再是唯一获得知识，取得成果的手段，利用电子计算机检索资料，利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统计结果，通过报刊、电视了解学术发展情况，迅速作出反应，是快出成果

的好方法。有人统计，过去一个世纪，学者们重复研究的概率高达百分之四五十，对新的资料、观点的了解，要长达几个月、一年、十几年，甚至一辈子都不知道，而今天则可以在几小时，几天内获悉，象日本汉学家对中国文、史新资料的了解、判断、分析、运用，有时比中国本国学者还早，就是利用了信息传递快，作出反应快的长处。因此，对于信息的了解和对于信息传播技术的掌握，乃是十分重要的事情。现代化研究者利用科学手段，完全可以避免撞车或重复无效劳动的现象出现，也可以迅速研究，作出反应，抢在前面，以取得成果。

面对这样一些趋势，我们应该怎么办？国内文史研究近年来有很大进步，但同时存在着不少问题，有一些领域长期未能突破，其中，学习、研究的方式陈旧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创造心理学认为，创造才能包括的主要因素中，记忆力只是其中之一（而且一部分机械记忆力现已可以由

电子计算机代替），主要的是探索问题的敏锐性、统摄思维活动的 ability、转移经验的能力、联想力、预见力等等，而上述这些能力的获得主要要靠知识的广博、对各种知识的灵活掌握和运用。然而，现在很多年轻研究者知识面比较窄，这固然与教育方式有联系，但一直用陈旧的方法学习与研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由于知识面窄，所以所站的位置就较低，所看到的领域就狭小，因而思维也受到限制，不能迅速提出新的设想和见解。很多老一代学者有这样的忧虑，年轻的一代本身也有这样的忧虑。“治学之道”栏目怎样在这些方面起作用呢？

以上的一些看法不知对不对，提出来请你们批评。我们的唯一希望就是不要出现“如今天上飞的是飞机，地上跑的是火车，而我们却骑着毛驴”的现象，更不要出现自己骑着毛驴还对飞机、火车闭目塞听的现象。

北京读者 郑克伟

在多样的方法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李泽厚

我从来不谈“方法论”，这个题目太大。如果说到对现在种种“方法论”的热烈讨论，我倒也有一点看法：

一、现在有些“方法论”提倡者好象急于找到一把适用于任何人、任何事的万能钥匙，我觉得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没有一成不变就能打开所有

锁的万能钥匙，也不要期望有一种对所有问题和所有人都适用的方法。即使是万能钥匙，开不同的锁也还要调整一下，治学方法恐怕也是这样。

二、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方法（其实“三论”是一论，即系统论）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我是最

早支持的。当时有“动态”说，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不同意，在《读书》一次座谈会上明确谈过自己的意见。但是，将自然科学的这些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不能只是直接地简单地套用一些新的名词、图表、公式，如反馈、黑箱，等等，这并不能真正解决多少问题；对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课题、不同的对象，所运用和处理的方法也应随之修正、改造和变化，否则科学研究就未免太简单、太容易了。并且“三论”也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它与结构主义一样，基本上是平面的、共时态的研究方法，对历史过程重视不够。在这方面，它可能还不及现代解释学的方法。所以，不要盲目地一窝蜂地抄袭、搬用所谓新方法，而应该是根据所研究的课题、对象的性质，有选择地在运用新方法中有所变革和创新，方法本身随着研究的发展也将得到发展和丰富。

三、我一贯主张多样的方法，即多途径、多层次、多角度地研究问题。从各个方面、不同角度和层次去研究同一个问题，才能反映得比较全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似乎习惯于搬用军事的方法，把一切都分为两大阵营。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农民阶级——地主阶级，等等，总是两军对敌的思维方式。我想，也应该不排斥其他方法，允许各种各样的方法存在。客观

真理是一个，而我们可以各有分工地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探索，以求更多地接近真理。多样的方法可以相互补充，彼此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一个丰满的学术整体。

四、同时，在研究方法上，还应研究一下自己。这也是重要问题。人们的性格、气质、背景、基础、兴趣、潜力、才能因人而异，每个人都可以具体地考虑、斟酌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文史哲研究的方法、成果，有时可以显示出研究者的个性、才能和特点。例如有人适合于搞精确考证，有人更长于提出理论问题；有的长于分析，有的喜欢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静的客观描述，有的则不免主观情感倾向的注入……。因为个性、才能、潜力、背景、基础等等不同，照搬别人的方法不一定对自己合适。善于发现自己的特点，也不容易，但如果有意地自觉地注意这个问题，注意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也许可以少走些弯路。

五、至于美学，我主张当前要多做一些实证研究，研究一些细致的具体的问题。我对研究生就是这样要求的，要求他们深入了解和研究现代美学中的一些问题，如审美心理、艺术史等等，而不要去写那种实在没有什么意思的空洞的所谓讨论或“争鸣”的文章。

兼容并包 各展所长

北京大学中文系 金开诚

客观世界情况复杂，“一窝蜂”、“一刀切”就不免失诸偏颇；而多样化的观念则较能反映客观情况，利于认识 and 解决实际问题。说到“治学之道”，似乎也不例外。“治学之道”应该多样化，这是由四个因素决定的：

第一，目标的多样化。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拿文史研究来说，显然要以文史古籍为重要资料，而浩如烟海的古籍远未整理完毕，因此，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之学就不可不讲，而传统的治学之道也大有可为。从道理上说，古书未经准确的校勘、标点、注释以至于翻译，在字句讹误，文义多歧的情况下，要谈充分发掘民族文化的精华，并作出多种多样的创造性运用，岂不是一句空话？然而，客观的现实要求却又不能允许人们把古籍都整理完毕之后（事实上这项工作永远也做不完），再来作各种研究和运用。因此，文史研究在同一个时期必然会有多种多样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就要使用多种多样的方法。

第二，学者的多样化。现在，我国还有许多学问渊深的老专家，他们历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尊重，而且至今仍在文史研究中努力作出贡献；他们的治学之道已由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行之有效，那么当然应该继续发扬，

并得到传承。但与此同时，现实中又的确出现了许多中青年学者，他们是在与老一辈学者不同的时代和经历中成长起来的，其中虽有一些同志仍谨守师法，但绝大多数人却事实上不可能再用传统的治学之道来取得较大的创造性成果，因此不得不在方法上另寻出路，甚至独辟蹊径。只要他们所取得的成果确实是有价值的，那就不能否定他们所用的新方法也是颇有效用的。于是传统的方法与各种新的方法就必然同时并存，各自发挥有益的作用。

第三，智能结构的多样化。学术研究的方法看来好象是为完成特定的目标而自然采用的，实际上却受到人的智能结构的制约。人的智能结构各有特征，在学术工作中又常常自发地出现扬长避短的倾向。例如记忆能力较强的人，便总要发挥他们的优势。这种自发的倾向往往影响到研究目标的选择，当然更会影响到方法的运用。在封闭性很强的封建社会，由于目标不够多样，因此许多人往往使自己的智能特征屈从于某种占有优势的学问。例如在汉学盛行之世，许多别智能优势的人也成了专搞章句之学的经生；而在宋学盛行之世，又有许多人“一窝蜂”地谈性说理。当今之世，情况大有改变。文学和历史都已有了

多层次、多角度、多目标、多方位研究的可能，于是各个研究者便自然要根据其智能特征之所在而充分发挥其优势，这也就必然影响到方法的多样化选择。

第四，在“知识爆炸”、信息畅通、各种学科多向联系的现代社会，文史研究决不可能停留在孤立的状态，而必然会出现各种新的交会与新的方法。它们将与传统的方法各奔前程，而分别取得各种有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都有益于祖国的文化建设，所以各奔前程又将殊途同归。

根据以上分析，治学之道由单一化变为多样化，乃是必然之势。《文

史知识》理应及时反映这种趋势，对各种研究方法兼容并包。既刊登深入阐述传统治学之道的文章，也适当介绍新的研究方法，特别要刊出一些运用新方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组稿对象方面，不但应兼顾老中青，而且应兼顾成名与未成名的作者，因为名实关系的规律总是先有实后成名，所以未成名的人很可能已经作出了一定的成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至于读者同志，则可以在多样化的方法传授中择其善者而从之，并在学习与研究实践中逐步形成带有个性特征的、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方法。

历史学与现代化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林甘泉

历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现在也和其他学科一样，面临着如何适应现代化建设步伐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一是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如何满足社会的需要；二是历史研究的方法要不要革新；三是史学工作者的知识结构怎样进行调整和更新。

什么是社会的需要？这就是“四化”建设的需要，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历史学也能够物质文明的建设中发挥作用，比如社会经济史、地区史的研究，对经济建设在宏观决策上就可能有所帮助。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不在这方面。如果要求历史学

在物质文明建设中发挥象科学技术或经济学那样的作用，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社会不应该向历史学提出这样的要求，史学工作者对此也应有自知之明。但是，历史学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却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是人们所熟知的。除此之外，还可以讲出许许多多。例如人民群众的道德修养和审美观念，都可以从历史遗产中汲取营养和获得借鉴。一个民族要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都是不可缺少的。现在社会上有些人认为学历史没有用，有些史学工作者自身也有“危

机”感，这是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缺乏应有的认识。有的史学工作者对“四人帮”影射史学的为祸之烈记忆犹新，为保持学术的尊严，认为历史学可以不考虑社会的需要，无妨为历史而历史，这是对历史学社会功能的自我否定。其实，“四人帮”的影射史学和社会需要恰恰是背道而驰的。任何一门学科，如果脱离了社会的需要，就不会有生命力。西汉经学自武帝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寔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汉书·儒林传》）。但结果怎样呢？对封建地主阶级有用的部分被继承下来并得到发展，而另外很大一部分则被遗忘、被淹没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这不仅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已成为一股强大的潮流。这股潮流势必影响、冲击历史学科。对它闭目塞听是愚蠢的，把这股潮流视为异端邪说更是错误的。近几年来，少数中青年同志尝试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引进历史研究领域，这是值得我们欢迎的好事情。系统科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思想，如综合性、整体性、目的性、量化、重视信息和反馈等等，确实可以帮助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突破原来的一些老框框，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例如，关于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有同志主张按行业、按地区分门别类地进行深入的研究，再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这些无疑都是应该做的工作。

但个别研究的综合并不能代替整体的研究。系统论有一个重要原则叫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意思是说整体具有其组成部分在孤立状态时所没有的新的特性和功能。这对于我们的历史研究应该说也是很有启发的。历史学要有新的发展，必须在方法论上吸收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这一点不应有什么怀疑。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历来讲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究竟怎样摆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系统科学方法论以及一些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关系？从原则上说来，谁也不会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但实际情况是，有的同志确实自觉不自觉地流露了贬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意义的情绪，或者企图用系统方法论和西方现代史学的一些理论方法来构筑我们史学的新体系。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实际情况，为了避免引起误解和认识上的迷误，我认为与其说历史研究的方法论要革新，不如说要吸收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更恰当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系统，它不但批判继承了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而且要求随着科学的发展，对自身不断加以修正、丰富和发展。在历史研究中，无论是我国传统的考据学的方法，或是西方近代和现代的实证方法，以及系统科学方法、计量方法、比较研究方法等等，只要对我们有用，都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发挥它们的作用。

既然历史学应当满足社会的需要

并且适应当今学术发展的趋势，史学工作者的知识结构就应当防止老化，要不断进行调整和更新，这也是不说自明的事情。但历史学本身就是一门知识密集的学科，一个人的精力又有限，要使知识结构的调整和更新真正得到最大的效益，而不致于事倍功半，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也许许多史学工作者宁肯埋头于自己的专业，而不愿向其他学科渗透的重要原因。要解决这个矛盾，首先还应从思想上重视知识更新的重要性。治学如积薪，总应后来居上。如果只是跟在前人的后头拾遗补阙，而不着眼于知识的更新，是很难超越前人的。当然，这决不是说可以不尊重和吸取前人的成果。事实上，如果不是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充分掌握前人的知识成果，也就谈不到知识的更新。还应该指出的是，知识结构的调整和更新，也要讲究合理性和目的性。我们不能要求史学工作者象熟悉自己的专业一样，熟悉其他学科的知识。章学诚主张“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博

而不杂，约而不漏”。这对我们今天说来仍然是有参考价值的。知识结构的调整和更新，不仅是对每一个史学工作者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史学队伍的要求。就整个史学队伍说来，需要有反映当代科学水平的复合的知识结构，但就每一个史学工作者来说，并不要求也不可能有同样的知识结构。即以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应用和中外历史比较研究而言，我们固然希望有条件的同志都能学一点这方面的知识，但更需要的是这方面的专门人才。他们的研究成果（不是皮毛的介绍，而是真正深入的研究）对于史学工作开创新局面无疑会有重要的作用。

《文史知识》创刊以来，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初学历史的青年同志喜欢阅读，许多专家学者也喜欢阅读。这说明即使是专家学者，也需要经常充实和更新自己的知识。希望《文史知识》今后更加关心广大读者和社会的需要，为历史学的繁荣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吸取新方法应以传统治学方式为本

北京大学中文系 葛晓音

《文史知识》编辑部组织“八十年代怎样治学”的讨论，要我谈谈自己的看法。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我还是个刚入门的小学生，实在谈不出多少经验，只能就我所写过的几篇论

文谈一点学习体会。

我于1968年从北大毕业，文革前只念了两年本科。1978年考回北大中文系，1979年考上研究生，对学术研究可说是一无所知。导师一方面鼓励

我确立自信心，一方面要求我扎扎实实地读书，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地啃。交读书报告务必有自己的心得体会，不许人云亦云。经过三年严格的训练，我在四、五十万字读书报告的基础上写了十来篇论文，初步摸到了治学的门径。毕业后又陆续写了十几篇论文。经过这几年的钻研，我逐渐体会出这样的道理：尽管我们这代人起步晚，底子薄，又缺乏从容念书的环境，若论功底，怕是一辈子也赶不上老前辈。但老先生们的满腹诗书，也是长期读书积累所致。书总是要一本一本地念的，研究却不一定要等一辈子的书都看完，把老一辈走过的路重走一遍之后才能搞。因为在研究某个课题时，仍然可以在局部范围内，尽可能掌握现有的全部材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创获。目前，文学史的研究还大有潜力可挖，用传统治学方式仍然可有新的突破。首先，有些领域还是生荒地，需要从头开掘。其次，如果把某些开发过的领域比作捡过一遍的白薯地的话，实际上前人也并没有把地里的白薯都捡光，有许多地方，甚至漏掉了很大的白薯。例如我在毕业后第一年备课时，写到北宋古文运动一节，把几种文学史一对照，就发现关于欧阳修嘉祐二年知贡举一事打击的究竟是西崑体骈文还是古文，说法含混不一。当时曾枣庄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欧阳修打击的是太学体古文。我又进一步研读了欧阳修的全部文章以及其他史料，考证出太学体流行的背景、时间、原因和代表

人物，弄清了这股文学逆流的来龙去脉。这一问题的解决，关系到透彻理解欧阳修的诗文革新理论，以及对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历程的重新评价。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只要读书细心，脑子里多建立几个触发点，遇见疑问深挖一层，就不难有新的发现。第三，解放前后所出的各种文学史论著虽有不同体系，大体发展趋势是由粗到细，但多以介绍分析作家作品为主，较少联系每个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宗教、哲学、文艺等背景，综合研究文学发展的外部规律以及艺术表现的特殊规律。对于各时期文学题材、内容、形式、风格变化的原因以及前后因革关系的研究还很不够，这也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研究的广阔天地。那么，要承担起这样的研究任务，是不是必须把传统的治学方式丢掉，另找既可以少读书、又能快出成果的新方法，才能开创新局面呢？

我认为从事科学研究没有取巧的捷径可走。老老实实从第一手资料着手，在掌握全部材料的基础上提炼出自己的见解，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作为指导，这种最基本的方法是永远有生命力的。而学术界从五十年代以来在研究方面走了许多弯路，进展较慢，并不是因为这种传统方法过时了，而是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把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当成了辩证唯物主义。有些文章并没有深入全面地钻研原始材料，只是为了迎合一时的形势而作。打倒“四人帮”以来，学术空气自由了，不少文章能

以客观辩证的态度分析问题，就对传统看法有所突破。综合研究的文章也在不断出现。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传统的治学方式与吸取新的研究方法并不矛盾。就以我所主攻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史来说，这一段几乎没有什么新资料可挖掘，又是前人研究最多的一块领域。这就迫使我必须学会从旧材料里发现新问题。我的努力方向是用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阅读陈旧的资料，找出其内在的联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以期得出新的结论。在这种研究过程中，如能从宏观的、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多方比较，往往可以解决一些在小范围内不易发现的问题。例如我在作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时候，力图从政治、经济、宗教、哲学、音乐、美术、社会风俗等各方面综合研究诗歌发展的背景和脉络，阐明初盛唐诗歌承前启后、不断完善的几个发展阶段。为此我详细读了《资治通鉴》、新旧《唐书》、《唐会要》、《通典》、《全唐文》中全部有关的史料，参考美术史、音乐史、兵制考、交通考等各种今人著作，从黑格尔《美学》、恩格斯《反杜林论》、西方作家论创作等理论书籍中吸取营养，把《全唐诗》中初盛唐部分一首一首从头念过，并尽可能搜集了历代诗话和各种唐诗选本的所有评论。从作品出发，把握总体倾向，以创作实践检验当时的文学理论，终于找到了初盛唐诗歌的基本精神，发现了我国诗歌革新中的风雅观念在不同时代有其不同含义。正是本着这种发展的观点，我在

写出毕业论文之后，又就这一问题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写出了五六篇带有系列性的论文，弄清了建安气骨的基本精神，晋宋齐梁诗歌的因革关系，文笔之辨的背景，南北朝隋唐文人对屈宋、建安文人不同评价的焦点所在，诗教说从汉魏到盛唐的演变，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等一连串问题，李白《古风》其一和杜甫《戏为六绝句》中某些疑点也迎刃而解。如果说这种前后比较、纵横联系地看问题的方法就算是多层次、多角度研究的新方法的话，那么它也是建立在传统治学方式的基础之上的。不但不省力，而且还要多花好几倍读书的功夫。如果不从第一手资料下功夫，任何方法都是架空的。

当某个作家或某一种文学现象被研究到无法深入的地步时，改换新角度确乎很有必要。例如我在八〇年读陶渊明的作品时，试着从诗画关系去研究我国文艺思想中形神观的发展，把陶诗的艺术成就放在晋宋时期艺术观的背景上来考察，当时被认为是比较新颖的角度。但改换角度同样要大量读书，尤其是将两种不同的学科联系到一起，必须对另一学科有较深的了解才行，否则就会闹笑话。我原来学过画，对画多少有点感性认识。为研究这个问题，我把晋宋以后所有的画论画史及今人的绘画研究专著都找来读过，又查阅了各种《世界美术全集》中汉魏隋唐的作品，还就某些问题写信请教了美术史专家常任侠先生，才敢得出自己的结论。如果书读得不扎

实，势必只能摭拾另一学科的某些名词术语，看起来很新，实际上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就不利于学术的进步。近几年很流行用禅宗思想解释王维的山水诗，有些文章生搬硬套佛教名词概念，对号入座，把王维山水诗说成是佛教理念在山水中的印证和投影。如果是这样，那么王维的山水诗和玄言诗、佛理诗还有什么区别？当前，开拓研究领域，广泛了解新学科，吸取新方法，是大势所趋。但改变角度、方法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五四”以来，学术界接受的外来概念并不少，来一个套一个，五十年代也有这个问题。今天如果我们对新学科、新方法一知半解，不加消化便用来解

释中国文学，那么这和五十年代又有什么两样？至多是把苏联的概念换成西方的概念而已。近年来，新名词层出不穷，但也有不少成为明日黄花，主要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文章有无理论深度，不在于作者是否能用新奇时髦的名词术语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阐述得更加深奥复杂，而在于能否用明快易懂的理论和概念解决前人所未曾提出和未曾解决的问题。新方法应当吸取，但必须真正弄懂它，分清利弊，扬长避短，为我所用。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吸取众家之长，融汇成真正适用于研究中国民族文化的科学方法。只有真正属于本民族的东西，才是有世界意义的，学术研究同样如此。



祝贺《文史知识》
创刊五周年

方 成作

编者按

建国以来，文史领域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其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沉痛的教训。李侃、章培恒二位同志高瞻远瞩，统观全局，对文史领域过去的成败得失进行了客观中肯的评述和冷静深刻的反省。

李 侃

在我国的学术界中，历史学是一个相当活跃的领域。三十多年来，广大史学工作者在历史学这块园地中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回顾我国历史学的发展过程，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

一

建国以来历史学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确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李大钊出版了《史学要论》，这是我国第一部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的史学著作。之后，经过广大历史学者的不断努力，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克服“左”的教条主义影响，克服了“四人帮”给历史学造成的巨大破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保持着旺盛的活力，而且继续向前发展。

确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过程，同时也是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再认识、再探讨的过程。三十五年来，我国史学工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根据，对一些理论问题和历史课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例如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史与论的关系、亚细亚生产方

回顾与展望

中国史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向